

为帝国主义服务的 人文地理学

張同鑄著

商 务 印 書 館

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人文地理学

蔡同德著

商务印書館

1960年·北京

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人文地理学

张同鑄著

商 务 印 书 館 出 版

北京东单布胡同 10 号

(北京市市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 107 号)

新 华 书 店 总 经 销

上海大东集成联合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12017·56

1959 年 6 月新 1 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60 年 5 月上海第 2 次印刷 字数 39,000

印张 1 12/16 印数 301—1,800

定价 (7) 0.17 元

內容提要

這是一本批判人文地理學的書。本書追溯這種理論的發展過程，指出了人文地理學產生的經濟上、政治上的條件，揭露了人文地理學的反科學的理論與概念，批判了它的唯心的、形而上學的方法論，並分析了它的本質和欺騙性，无可置疑地證明它是直接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最後並指出人文地理學思想在中國的影響。本書對我們認識並批判人文地理學思想的殘余，學習和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地理科學是很有幫助的。

本文曾發表在“地理學報”第二十二卷第一期，作單行本出版前作者作了一些修正。

本書原由新知識出版社出版，自1959年6月起改由我館出版。

統一書號：12017·56

定 价：0.17 元

目 錄

前 言	1
第一章 人文地理学的產生与發展	3
第二章 人文地理学怎样为帝國主义服务	13
一 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歪曲	13
二 对于國內劳动人民的貧困与殖民地國家的落后的謊言	21
三 对于帝國主义侵略行为的辯护	28
四 唯心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論	36
第三章 人文地理学思想在中國的影响	45

前　　言

長期以來，在學術文化領域中，不斷進行着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辯證法反對形而上學的鬥爭。這一鬥爭，反映了真理與非真理、科學與偽科學間的衝突，也反映了先進的無產階級和沒落的資產階級間的衝突。唯心的、形而上學的學術思想，是徹頭徹尾服務於資產階級利益的東西，在現在，它是服務於壟斷資本利益的東西，它是科學前進中的障礙，社會主義事業的敵人。

地理學中的人文地理學，就屬於這類偽科學的思想體系。人文地理學是流行於現代資本主義世界的帝國主義思想武器之一，它以研究自然與人生，即地理環境與社會發展為主題，散佈地理環境決定人生活動、決定社會發展的思想毒素。40年來，它在舊中國地理學界已建立了牢固的統治，直至今天，仍然沒有從我們地理工作者的思想中徹底予以清除。我們必須和這種唯心的反動地理思想進行不調和的鬥爭，揭露它，批判它，並最後的肅清它。不這樣，馬克思列寧主義地理科學就不能充分發展，地理科學在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就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充盈於資本主義社會的人文地理學種種錯誤理論，都是一些為資產階級辯護的謠言，我們沒有必要對它們——加以分析與揭露。在本書中，作者僅就人文地理學幾個主要方面進行分析批判。書中較多征引的資產階級地理學家著作，以他們在資產階級地理學界有著一定的代表性、並對舊中國地理學界起著深刻影響的為限。顯然，這樣作法在分析批判的深度和廣度上還是不夠的。作者希望借此引起我國地理工作者進一步的重視，以

共同的力量肅清人文地理學思想體系的殘余，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地理科學的勝利發展扫清道路。

本書在寫作時蒙孫敬之教授指導，仇為之先生提供許多寶貴意見，特此敬誌謝意。

張同鑄

一九五六年八月，南京

第一章 人文地理學的產生與發展

馬克思主義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學說，揭示了一切思想和各種趨向歸因於物質生產狀況的根源，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指出了正確的道路。人文地理學是一門社會科學，它是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地理學進一步發展過程中的產物。人文地理學的基本思想，雖是庸俗的地理決定論，但它的各種表現形態，則從屬於一定時期的社會經濟條件，服務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階級——資產階級的利益。因此，我們有必要簡略地考察一下人文地理學發展過程中的歷史背景。

以自然環境解釋社會現象的思想，在人類歷史早期就已存在，但對於這一觀點作具體而系統的論述，則始於18世紀法國的孟德斯鳩。孟德斯鳩在他的“法意”一書中，發揮了氣候決定人生的觀點，認為人類的風習和宗教信仰、各個民族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首先由氣候的特殊性所決定。孟德斯鳩這種思想，會得到廣泛的傳播。

環境決定論的系統“理論”產生於18世紀，並突出的見於法國，其原因何在呢？我們認為，這是與資本主義的成長發展密切相關的。

資本主義時期開始於16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首先表現為生產力的發展，由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並促進它和舊的封建主義生產關係的矛盾，導致政治制度的變革。例如17世紀的荷蘭和英國，都先後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

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當英國的工農業急劇資本主義化的時候，德國的容克地主經濟尚占統治地位，帝俄還牢固地存在着農奴制度，其資本主義因素都還薄弱；法國的資本主義發展，過于德俄而不及英國，那時法國東北部、西部和南部沿海城市都發展着大規模的企業，農村工業廣泛流行，對外貿易也頗為發達，說明其資本主義的發展，已達到較高的水平。但法國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處于強力束縛之中，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的統治，天主教對新教的壓迫，處處形成了舊的統治階級（地主和僧侶）和新的資產階級（以及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手工業無產階級）間的尖銳矛盾，使法國成為新生產力與瀕于崩解的舊生產關係激烈衝突的國度。

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科學被推動前進了，天文学、機械學、物理學、解剖學和生理學都發展起來，而頻繁的世界貿易，使得人們的地理知識也更加豐富了。這些進步，促進了唯物主義哲學的抬頭，並使它與封建社會中的宗教思想與神祕主義之間的對立，更趨激化。

由此可見，17—18世紀西歐各國新的生產力與舊的生產關係的矛盾及其轉化，表現為新舊哲學思想、新舊政治觀點的對抗。這種對抗，首先出現於矛盾最尖銳的法國。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法國啟蒙學派，從不同角度展開了反對封建主義一切力量和秩序的進攻，乃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孟德斯鳩的自然神論觀點（它與神祕主義相對立），就是在這一條件下產生的。

孟德斯鳩以後，各國社會學中的地理學派多發抒相同的或類似的觀點，例如康德、黑格爾和侯爾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等人，都把歷史的基礎建築在地理之上，代表典型的地理史觀^①。19世紀，地理決定論思想得到了更廣泛的發展，著名的“英國文化史”作者卜克爾（Henry Buckle）擴大了地理因素

的範圍，將它歸結為氣候、食物、土壤和一般自然面貌四類，認為它們可以“決定”人類勞動的性質、思維和性格的形成、民族富裕的情況、宗教的產生和存在；甚至社會財富的分配，好像也要“服從於特殊的自然法則”。法國的列普來（F. Leplay）及其思想繼承者們從地理環境限制了工作種類、工作至少部分地形成了社會組織的思想出發，認為社會組織和活動必然地為它們的自然環境所決定。地理決定論在俄國同樣有着很多的擁護者，培爾、史恰波夫、梭洛維約夫、密奇尼柯夫、克琉徹夫斯基等可為代表。他們除了重複西歐地理學派的老調外，還把水的因素作為“歷史的真正動力”^①。

流行於當時社會學中的地理決定論，順利地侵入了發展中的地理學領域，成為人文地理學的指導思想，並賦予人文地理學以反動性質。

資產階級人文地理學的奠基人李特爾（Karl Ritter, 1779—1859），曾受康德思想的強烈影響。他的自然統一體觀念，把人文現象和自然現象納入同一範疇，並從其中尋求相互的因果關係。例如，他在柏林大學所作的講演中，對於各洲的大小、形狀、構成及氣候情況作了系統的敘述，並特別表明這些情況在歷史各階段中如何決定各大陸民族的發展。這可以具體說明他的思想面貌。

被稱為人文地理學“開山祖師”的拉采爾（Friederich Ratzel, 1844—1904），資產階級地理學家認為他是文化地理學科學

① 康德認為“地理是歷史的基礎”，黑格爾在其“世界史的地理基礎”一文中表示了相同的觀點，侯爾德謂“歷史是行動中的地理”。三人對於歷史發展的看法基本一致。

② 見伊凡諾夫—歐姆斯基“歷史唯物主義論地理環境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1954年三聯書店版第39—50頁。

系統的建立者①。他的代表著作“人類地理學”(第一卷 1882 年出版，第二卷 1891 年出版)，是在李特爾思想基礎上，接受达尔文進化論的思想寫成的。在這部著作中，他把研究生物分佈所得的基本觀念用來說明人類分佈的現象。拉采爾的另一重要著作，是被臭名昭彰的地緣政治學奉為經典的“政治地理學”(出版于 1897 年)。

拉采爾是個徹底的地理環境決定論者，他認為只有注意作為人生活動的真正“基礎”的地理環境，才能了解和平的經濟生活，才能了解戰爭(此項主張，見于其所著“政治地理學”)。拉采爾把地理環境對人類的影響歸結為四個方面：(1)直接的生理的影響；(2)心理的影響；(3)對於人類社會組織和經濟發達的影響；(4)支配人類的遷徙及其最後的分佈之影響。在拉采爾的心目中，地理環境有著駕馭一切的力量，“它盲目而野蠻地支配著人類的命运”②。

拉采爾這一錯誤思想，是和當時資產階級的要求相適應的。19 世紀末期，資本主義已開始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週期重複發生而愈益兇猛地危及全部資產階級社會生存的商業危機”③，說明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矛盾已發展到驚人的程度。此時，德國的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工業生產已超過英國，躍居歐洲第一位；德國無產階級已經形成並日益強大，要求在革命鬥爭中起獨立的歷史作用。因此，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拉采爾等人，就緊緊抓住地理決定論這一武器，把一切命定於自然，以便實質上為資產階級的剝削辯護。

① 斯密特語，見哈特向“地理學的本質”第 90 頁。

② 拉采爾雖然也提到人可以彌補自然條件的缺陷，但在他的思想體系上，則完全加以漠視。

③ “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 1954 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版第一卷第 43 頁。

拉采爾的思想在德國有着不少的繼承人，瓦格納（H. Wagner）、赫特納（A. Hettner）、史呂脫（O. Schlüter）、弗里德里赫（E. Friedrich）等可為代表。拉采爾的觀點，也迅速為英美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所接受。美國的森普爾（E. C. Semple）是其重要的傳播者，她的“地理環境之影響”和“美國歷史及其地理條件”兩書，就是全面地介紹並發揮拉采爾論點的作品。至于英法的人地學著作，一大部分受到拉采爾的影響①。騷爾（C. O. Sauer）認為，“拉采爾學說之影響，見于德國本境者，反不若見諸他國者為多。美國有森普爾，英國有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皆承襲拉氏之後，以發揮自然影響人生之學說。”②我們知道，終森普爾一生（死于 1942 年），一直保持著她在美國地理學界的權威地位，而美國的泰勒（G. Taylor）、亨丁頓（E. Huntington）等人都是環境論的重要代表，可見拉采爾的地理決定論思想，起着怎樣深廣的影響。

拉采爾的武斷的必然論觀點，雖然流行迅速，但很快就遭到資產階級學者的反對與批評。因此，在拉采爾以後不久，又產生了法國的人地學派——或然論。

我們知道，19 世紀最後 30 年代，是科學技術飛躍進步的時期。1873 年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以後，掀起了促進新的生產方法的技術革新大浪潮，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加速地改變了社會經濟的面貌。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資產階級占得階級統治地位還不到一百年，而它所造成的生產力却比先前一切世代總共造成的生產力還要宏偉眾多。”③ 人們清楚地看到，人在

① 見白呂納“人地學原理”鍾山書局譯本（下同）第 39 頁。

② 騷爾“西洋人地學晚近之發展”，見“新地學”第 80 頁。

③ “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 1954 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版第一卷第 42 頁。

社會生活中發揮着亘古未有的巨大作用，并非听命于自然，这就使得“必然論”的論点不能令人相信。

其次，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衝突更加廣泛深刻起來。在國內，有財富更加集中與無產階級更加貧困更加壯大的矛盾；在國際，有財政寡頭間爭奪原料基地、商品市場和投資場所等等的矛盾，有宗主國對殖民地的壓榨與殖民地人民反抗宗主國的矛盾。這些複雜的社會現象，也遠非單純的地理環境所可解釋。

最後，馬克思關於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發現，徹底推翻了資本主義制度永恆的偽說。當時資產階級的哲學思想，以實証論最為廣泛流行。實証論的創始者法國哲學家孔德(A. Comte)，站在休謨的懷疑論和唯心論的立場，否認世界的可知性，認為一切處於感性認識範圍以外的東西，都是不可理解的。孔德斷言觀念支配世界，思維的發展決定全部人類社會的發展。孔德露骨地代表著已經成為反動的資產階級觀點，而與馬克思的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相對立。實証論的思想，就從哲學上影響了當時資產階級的學術界，其中也包括地理學界。

法國的人地學派——或然論，就是在上述條件下產生的。

人地學派創於 20 世紀 20 年代，以法國的白蘭士 (Paul Vidal de la Blache)、白呂納 (J. Brunhes)、費伯 (Lucien Febvre) 等人為代表。人地學派修正了拉采爾的“必然論”，標榜“或然論”。出身於歷史學家的白蘭士，認為“環境包含著許多的或然性，這些或然性的利用，則完全依於人類的選擇。一種社會的複合深入於習慣，因此可以使一定的或然性得到了否定的結果。總之，顯著的心理學的事實，與氣候和土地對於人類行為的固執的命定的支配，正是一種對照。”^① 費伯在其“歷史之地學的

① 轉引自狄鑑生、霍瓦士“地理學發達史”中華書局版第 273 頁。

導言”一書中，對“必然論”猛烈攻擊，并創立了“或然論”這一名詞。白呂納的“人地學原理”一書集中而全面地表达了人地學派的觀點，認為人地關係是相互的，不是片面的。“天定足以勝人；人定亦足以勝天”。而人地關係的變化，則以心理因素為轉移。白呂納基於他皮相的觀察，把人地關係的事實按所謂“純然地學的”分類原則分為三綱六目：(1)地面上建設事業之不能生產者：房屋與道路。(2)動植物的利用事業：種植與畜牧。(3)經濟上的破壞事業：開礦、動植物的採取①。他还選擇了“人類社會中的小島”(沙漠中小島和山中小島)進行考察，企圖証驗“自然與人生間嚴正的地理關係”。但我們知道，這並沒有真正說明問題。

人地學派思想在美國頗為風行(“人地學原理”英譯本于1920年在美國出版)，鮑曼(I. Bowman)、亨丁頓(E. Huntington)、巴羅士(Barrows)、湯瑪斯(O. J. Thomas)、騷爾等，都是美國重要的人文地理學家。亨丁頓和克興合著的“人生地理學原理”是一本通俗的而在美國流行極廣的書，它和鮑曼的“地理學與社會科學的關係”等書，對舊中國地理學界都有很大的影響。

英國的人地學也十分發達，一般認為人地關係在於“調整”，在於“適應”，赫伯生(A. J. Herbertson)、麥金德、弗留爾(H. J. Fleure)、斐格萊(J. Fairgrieve)、羅克斯貝(P. M. Roxby)等人可為代表。

必須指出，人地學派只是“必然論”的變種，它的真实面目仍然是環境決定論與主觀唯心主義。目前人地學思想正充當資產階級的武器，為資產階級的罪惡活動進行辯護。因此，必須堅決予以揭露。

地緣政治學是人文地理學的另一表現形式，是直接服務于

① 白呂納“人地學原理”第55—60頁。

壟斷資本利益的工具。

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的剝削與奴役，更加普遍與深刻起來，“帝國主義就是資本之超越民族國家底界限，就是民族壓迫在新的歷史基礎上之擴張及加緊。”^①我們知道，正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的殖民地已被這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分割得一干二淨。

然而，殖民地的分割是極不均衡的。法國的殖民地約等於德日殖民地總和的兩倍，英國的魔掌則伸到全世界各个角落。這種情況，不可避免地要為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的絕對規律所打破。

因此，“重新瓜分世界”成為年青的強大資本主義國家的共同要求。地緣政治學正反映了這種要求。

德國更加具備產生這一偽科學的客觀條件。

1871年德意志統一以後，國內資本主義得到非常迅速的發展，在19世紀末葉，德國工業就已躍居歐洲第一位。德國的壟斷資本發展起來，產生了擴大國外市場和工業原料地的需要。由反動政客、軍官和大工業資本家所組成的“泛德意志聯盟”，就為對外掠奪進行宣傳鼓吹，要求歐、亞、非、美各洲的土地。德國大部分的報刊也同樣宣傳這一狂妄思想。顯然，這一股兇惡的洪流，不能不反映在各種社會科學上面。

其次，德國自宗教改革以後，國內長期陷於混戰狀態。統一的德意志帝國，是在不斷的掠奪戰爭中成長起來的軍事國家。以黑格爾等人的權力哲學為基礎的普魯士反動的軍國主义思想和日耳曼的狹隘民族主義精神相結合，構成了向外擴張統治其他民族的思想根源，由於經濟上歷史上的必然性而產生的德意志

① “革命的無產階級與民族自決權”，“列寧文集”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冊第142頁。

帝國的成長合併過程，則被它利用為進一步政治擴張的論據。因此，就促進形成了地緣政治學這一荒謬的思想體系。

其三，19世紀後半期，德國的庸俗唯物論哲學思想廣泛流行。他們錯誤地把达尔文的生物學的規律移植到社會生活里來，把一切階級的區分、把進步和落後人民間的區別歸結為由於所受的營養料性質之不同而造成的腦力的富或貧乏。實證論哲學代表之一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同樣也鼓吹社會“有機論”，把人類社會和生物有機體等同看待，歌頌階級社會的“合理”與“完滿”。這種庸俗化了的达尔文主義的氾濫，對於地緣政治學的中心思想——國家有機體論的形成，同樣也有積極的意義。

地緣政治學的“始祖”，也是這個拉采爾。他在“政治地理學”中，用地理環境解釋政治現象，同時也用生物學規律說明國家發展的過程。我們認為，處於德國當時社會條件之下，作為一個自然科學家、特別是動物學家而又服過軍役的拉采爾，其易于接受上述思想的影響，是十分自然的。

拉采爾基於其所捏造的“國家有機體”的命題，把國家的空間擴張作為其發展過程中的必然“規律”。拉采爾提出國家的三個地理因素——領土範圍、地理位置、國界性質，就完全適合於“國家有機體”這一概念。

適應於當時德國資產階級和地主貴族的領土擴張要求，拉采爾胡謬了“地理統一體”這一概念，把德國和它的鄰邦（荷蘭、法國和多瑙河流域各國等）“統一”在一個“地理單位”之中，認為這個“地理單位”政治上應該隸屬於一個國家（這個國家當然他是指的德國）。這樣，拉采爾就從地理學的見地上“論証”了德國向外侵略的合法與正確。

本世紀初，由於德國壟斷資本的進一步發展，它的領土擴張

野心更大。于是拉采尔的上述观点，被全盘接受下来并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德帝国主义者的忠顺奴仆瑞典人吉伦(R. Kjellen, 1864—1922)，在其“国家有机体论”(1916年出版)一书中，就公开为德国的擴張鼓吹，在该书中，吉伦还創立了“地緣政治学”这一名詞。

希特勒統治下的納粹德国，地緣政治学达到了空前的發展。以豪斯霍菲尔(K. Haushofer)为首的德国地緣政治学家，为了迎合其主子的要求，在著作中強烈地要求“生存空間”。他們不但要求在“凡尔賽和約”中失去的土地和殖民地，甚至把大半个欧洲的領土也包括進这个“生存空間”的范围。很簡單，一切他們这类的叫囂，不过是为德国壟斷資本、容克貴族与軍國主义者的領土擴張要求找尋根据而已。

應該指出，“地緣政治学”这一伪科学，在各个主要帝國主义國家，特別是美國、英國、日本(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等國，都有翻版，而且被改头换面，以符合于各該國家各該階段的具体利益。美國、英國早在本世紀初就搬用了地緣政治学的“理論”，英國的麥金德、美國的馬罕是突出的代表人物。日本進入壟斷資本主义較迟，在其向外侵略的过程中，地緣政治学也跟着得到傳播，臭名远揚的“大东亞共榮圈”，就是它在日本的翻版“杰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地緣政治学又在美国風行起來了，美国的“学者”、教授、政論家、軍人日益众多地鼓吹地緣政治学。他們在“战略防御”、“空权时代”的掩飾下，公开宣傳無限制的擴張。而这不过是服务于美国財政寡头的利益，企圖达到由美国人來統治世界的幻想而已。

人文地理学發展到了地緣政治学阶段，已經和科学沒有絲毫共同之处，它表現了和現阶段壟斷資本相同的腐朽性与垂死性，因此也必然地随着帝國主义的崩潰而徹底消滅。